

NANKAI LINGUISTICS

南開語言學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2006年

第 2 期

(总第8期)



商務印書館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6 年第 2 期

(总第 8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06年第2期:总第8期/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ISBN 978-7-100-05388-4

I. 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013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ǔYÁN XUÉKĀN

南开语言学刊

2006年第2期(总第8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388-4

2007年1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1

印数4 000册

定价:18.00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编 马庆株 石 锋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刘丹青	孙茂松	朱庆之	朱晓农
江蓝生	邢向东	吴福祥	张洪明	张 敏	李宇明
李行德	沈家煊	远藤光晓	陆丙甫	麦 耘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唐钰明	徐大明	袁毓林	曹志耘
黄 行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马秋武 王红旗 石 锋 周 荐 洪 波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执行编辑

王吉辉 冉启斌

目 录

• 特稿 •

谈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	王 宁(1)
---------------------	--------

• 语音与音韵 •

实验音系学与汉语语音分析	石 锋(10)
《太和正音谱》北曲谱考察——兼论周德清“入派三声” 问题	施向东、高 航(26)
从泰汉关系词看中古汉语三四等韵差异	黄笑山(37)
从音轨方程考察普通话不送气塞音声母的协同发音	冉启斌、石 锋(45)
形容词 ABB 式的声调读音考察	马志伟(55)

• 语法与词汇 •

明清小说里“数量词+N·们”式名词短语的类型学价值	储泽祥(62)
对类比的辩证分析	马壮寰(68)
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完成”体貌助词“哩/咧”	王景荣(76)
内部形式的变动与词语的意义	王吉辉(83)
太原市双方言词汇使用现状的调查	〔韩〕郑彰培、国赫彤(91)

• 语言教学 •

普通话口试中几种形式的相关度分析	刘 艺(98)
主观文化与第二语言教学	祖晓梅(104)
一项基于参与负荷假说的实证研究	段云礼、孔祥永(112)

· 研究生论坛 ·

- 从物到人的词义演变研究 冯海霞(119)
动词郑重色彩对重叠的制约 吴燕萍(124)

· 译文与评述 ·

与地域性和全球性的动植物命名

- 有关的问题 马提索夫作,刘劲荣、周建华、刘芳译(130)
中古汉语发音方法类型的来源——透过苗瑶与汉藏语看
上古汉语的鼻冠音声母 沙加儿作,谷峰译,曾晓渝校(148)

· 博士论文摘要 ·

- 指称论 王红旗(156)
彝文的源流 孔祥卿(157)
汉语中和调的跨方言研究 梁 磊(159)

南开语言学高级论坛成功举办 (161)
2006 年全国现代语音学高级研讨班成功举办 (162)
2006 年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成功举办 (163)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通知 (160)

本刊启事 (36)
征稿启事 (103)

英文提要 (164)

Contents

Special

Self-innova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 Research Wang, Ning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Experimental Phon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Phonology Shi, Feng

Investigation on Beiqupu of *Taihe Zhengyinyu* Shi, Xiangdong; Gao, Ha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hird Rhyme and the Fourth

Rhyme in Mediaeval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ds of the Same Etymology in Chinese and the Language

of Thailand Huang, Xiaoshan

Locus Equation and Co-articulation Study of Un-aspirated Stops in Standard

Chinese Ran, Qibin; Shi, Feng

The Study on the Tone of the Adjective Pattern of ABB Ma, Zhiwei

Grammar and Lexical

Typological Values of the NP—"Numeral-Classifier Compound +

N+Plural Marke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u, Zexiang

A Dialectic Analysis of Analogy Ma, Zhuanghuan

On *Li/Lie* Denoting the Completion of Actions in Donggan

Dialect and Han Dialect of Wulumuqi Wang, Jingrong

The Changes of Inner-forms and the Meanings of Fixed

Expressions Wang, Jihui

A Survey On the Bilingual Vocabulary in TaiYuan City

..... [The Republic of Korea] Zheng, Zhangpei; Guo, Hetong

Languages Teaching

-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ertain Forms in Mandarin Oral Test Liu, Yi
Subjective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Zu, Xiaomei
An Experienti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 Duan, Yunli; Kong, Xiangyong

Graduate Student Forum

- Meaning Change from the Category of Denoting Substance to
That of Denoting Human Feng, Haixia
The Restriction Imposed by Formal Style on Verbs Composed
of Reduplicated Characters Wu, Yanping

谈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

王 宁

提 要 本文从语言在当代的重要性这一话题入手,分析了语言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的变化趋势;提出语言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对于西方语言学,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亦步亦趋地盲目接受;对于中国传统语言学,既要认识到它的弊端,也要继承它的精华。这样才能实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

关键词 中国语言学 西方语言学 自主创新

一 语言在当代的重要性

目前,语言学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语言学在中国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学科,在高等学校被划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其实只是文学的五分之一。现在,由于它的应用性和研究方法与科技的结合,逐渐成为一个大学科。比如说,在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中,申请语言学的项目比起“九五”规划初期,增加了十几倍,心理学、教育学、信息科学、地理学、历史学、文献学、法律学……都有来申报语言学项目的,可见语言学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处在这个学科建设与语言教育的第一线,责任越来越大。

语言现在正在被两个东西推动着,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需要语言交流,语言交流就必然会有第二语言教学。最初欧洲人到美洲时;需要懂得当地土著的语言,因而有了跨文化的语言交流。二战中,苏联、美国等强国与世界各国接触,出于跨国交流的需要,产生了一种把语言理论运用到第二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近几年各个国家都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快,大家就关注哪个国家的语言。汉语在全世界的地位猛然提高,很多国家的人都要求学习汉语。这也说明语言学的研究和应用已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推动语言学发展的原因是民族独立运动。民族的独立和语言的关系已经变成一个内在的东西。应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保护自己的语言,任凭自己的母语受到威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感觉到主权的危险性。这个问题已经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 本文是我 2006 年 6 月 4 日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进行学术交流的发言,经《南开语言学刊》编辑部根据录音整理后修改为现在的文本。感谢学术交流的组织者与文稿的整理者。

中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苏联解体时,当时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跟俄罗斯的很多矛盾也体现在语言上,他们要求用自己的母语来说话、发言,要求用自己的母语来建立自己独立的外交,所以,语言成为苏联解体时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恢复希伯来语。有人问他们:“你们连国家都没有,怎么就恢复语言呢?”一位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斯摩梭金(1840—1884)曾说过:“你问我,一种死亡的语言(希伯来语)有什么用,我要告诉你,它赋予我们荣誉,给予我们力量,把我们团结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在追求永存,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在期盼独立的那一天。如今我们既没有纪念丰碑,也没有国家,希伯来语就是我们古代光辉残留下来的唯一遗迹。”^①我们举出这两个实例,无意评论其政治上的是非,只是想说明,母语问题实际上早就不只是关系到语言教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语言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日渐被关注。最近,我们在很多报道中听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频频说明“英语是美国的母语和官方用语”,虽然这是任何现代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在正式场合一再说明,不过是表示国家对自己母语的重视。

前不久,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了“法国总统希拉克周三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时,因不满一名法国商界领袖在会上讲英语而愤然离场。”这篇报道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据悉,当时欧洲工业及雇主协会联盟(UNICE)的负责人——法国人塞埃正以英语向欧盟二十五国领导人发言,希拉克即时打断他的讲话,并质问他为何说英语。塞埃回应说:‘我打算以英语发言,因为这是上午语言。’希拉克二话不说,随即起身离开会场,以示不满,在场的各国领导人无不感到惊讶,而法国财政部长及外交部长也跟随离场,待塞埃讲话完毕后,他们才一起返回会场。”^②对于希拉克的离场,有人认为违背国际惯例,因为,自2004年10个来自东欧的国家加入欧盟以后,英语已经取代法语成为欧盟的通用语言,塞埃用英语发言是可以的。但是,欧盟首脑会议备有完善的传译服务,因此,参与会议的领导人可以以20种欧盟官方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发言。显然,希拉克认为塞埃应当坚持使用法语。我们可以从希拉克的举动中看到一种民族与国家的自尊心,也可以看到语言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二 语言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变化的趋势

语言学跟过去确实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国的语言学是被放到“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如果按照现在国际上的分类,语言学就是一级学科,语言学下面有各个国家的语言的分科,而不是“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一个分支了。从国际学科分类来看,语言学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语言学的研究非常需要一批人来把它推进得更深入,发展得更迅速。现在国内有很多论争,大多离不开中西方语言学的撞击。中西方的文化和各种学术撞击,在“五四运动”时代是很尖锐的一次。现在这个问题又重新尖锐起来了,让我们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选择一个

^① 转引自《国家、民族与语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编,语文出版社,2003年)。原注:这段话引自“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69页”。

^② 这篇报道见香港《星岛日报》2006年3月25日A36版。

妥善的立场来对待。语言学的发展,这十几年有几个很重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个变化是,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20世纪语言学大家都主要关注语言的形式,重视对语言的描写,这个发展对语言学的科学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的语言学,随着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需要,关注语言形式的研究虽然还在逐步发展,但是,应当看到,在重视描写的同时,大家正在追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一种语言现象,不描写,显示不出来,无法觉察,根本不能认识它,更无法处理它;但是,如果不在描写出来以后回答“为什么这样?”也就是从描写走向解释,严格地讲,就没有完成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因为,语言属于人文科学,它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类自身。我们发现了一种语言现象,不知其所以然,不但没有能够了解我们自己,而且也会妨碍我们进一步描写的准确性,更不利于对描写成果的验证。由于从描写走向解释,语言学与心理学、人类学、信息学以至哲学的交叉就日渐成为一种需要,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第二个变化是从第一个变化来的。一旦进入描写与解释同步进行的情况,严格的共时和历时的界线就不得不打破。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在20世纪分得非常严格,界线非常分明。描写语言学是共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时的,目前这种界线正在逐步模糊。在描写的时候肯定要坚持共时,但是如果想做解释,完全的共时是做不到的,必须借助于语言的发展历史。而且,语言学有没有绝对的共时,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我们可以从“语法化”过程中看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已经认识到“语法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每一个层面上,它都积淀了不同的历时的现象。如果我们仅仅把某个时间段切出来,一点历时的眼光都没有,没有看到很多现象是历时并存的,有些问题就得不到解释。比如研究先秦的古汉语,大家以前认为先秦古汉语是一个共时的语言层面,可是我们从语法化理论中受到启发,知道即使先秦古汉语中也积淀了不是同一个时期发生发展起来的现象。在我们以为是共时现象而并列起来的语言规律中,常常积淀了不同时代的东西。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先秦古汉语的定中结构中的“之”字,我们在基础教学里把它一律讲成助词。但是,就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本专书里,就可以看到这个“之”从代词慢慢地虚化为助词的不同程度,共时的“时”划分得再短,不同时代的积淀也会存在。很多现象并不是一个时期产生的东西,只是应用在同一个层面。另外,汉语研究的各种语料实际上都不是共时的,我们用作方言调查的《广韵》就是一个融合古今南北语音的异质系统,它里面很多内容不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我们再看文言文,文言文是先秦的口语,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个被模仿的语言。作为历朝历代的书面语,它一直跟口语是并行的,在每一个时期,文言文都横向地去影响当时的口语。文言文影响白话的力度,书面语影响口语的力度比口语进入书面语的力度要大得多,强烈得多。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书面语属于上层文化,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上层对下层的辐射作用当然远远要超过下层对上层的辐射作用。再说,书面语的载体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它的影响力自然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文言文的横向影响。这种影响我们无法用绝对的共时解释。

第三个变化,就是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是语法。从《马氏文通》以来,我们跟着西方走,语法是一个显学。在21世纪前后,我们看到,语义的因素越来越浸入到语法研究中,在完全纯形式研究的过程中间,如果语义不介入,很多问题就没法深入下去,也无法解决。所以语义的介入也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以语义研究为中心,它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第四个变化,我们过去强调的是语言学的普遍性。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十几年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我们必须把各种语言都研究透彻,才能从里面归纳出来真正的普遍性。如果这种普遍性不能覆盖某一种语言,我们就不能说它有普遍性。汉语介入世界语言研究的时间比较晚,在汉语研究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会看到过去很多所谓的“普遍性”里面很多是不能解释汉语或者说覆盖汉语和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这就说明这些“普遍性”还不是很彻底。汉语的介入会给语言普遍性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因素,这样的一个新的语言学研究的视角,会对我们过去研究或追求的东西产生极大的冲击。

这四种变化有些很像是一种倒退与复辟,其实不然,它是“否定之否定”。如果说,我们在追求语言学科学化的过程中曾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拾回以前我们失去的另一个极端,我们在方法论上会走向辩证与全面。

三 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一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比如说音韵研究,很多人通过文献来研究,也有通过口语来研究的。古代音韵学跟现代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值得重视,因为,汉字的表音机制很差,古代的语音不论是直音还是反切,都是用汉字来表示,不容易分析出音素,没有参照,我们得到的信息比较笼统;但是,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虽然遗存了汉语古代的东西,但它也是经过演变的。它已经不是古代的面貌了。如果我们不承认语言是演变的,认为古代的语言是完全以原貌保留下来的,不要说语言做不到,连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都做不到,可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头都不是过去的石头了,是不能简单替代的。近年来有了不同语言的对音研究,是聪明人想出的办法;但是,音系不同,音译在许多地方是削足适履的,也不可尽信。用谐声偏旁来证实已经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但谐声字造字不是共时的,更不是共域的,可参照的因素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拿《广韵》去推上古音,用《诗经》系联,这些工作也都带有一些不确定性。古音韵研究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其实大都属于不同程度接近事实的假说。这些假说只要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都有研究价值。但是,都必须综合,互相印证。所以,方法越多元化,越容易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清代音韵学讲究考古和审音结合,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就强调一种,互相排斥,认为别人的方法不对,那么到最后,仅凭一种方法,谁也不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结论。不过,有没有一种研究路线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呢?可能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作为音韵学的外行,也说一说旁观者的看法。我觉得,我们难以构建每个音的音值,但构建音素之间的关系,可能能够比较准确,也比较有用。所以,就研究目标来说,音系研究可以作为基础。在所有的材料中,还是自己的文献记载信息更多一些、价值更全面一些、涉及的时间也更长一些吧?所以,以文献资料作基础,再参照其他资料和方法,可能更少走弯路。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方法多样化,但在多元的方法中,要强调一个“基础”。如果在相互排斥中把这个“基础”给拱掉了,那就不仅仅是结论不完满的问题,而是研究很难起步的问题了。所以,保护研究

的基础,进入方法的多元化,是语言学研究中值得不断提倡的问题。

四 冷静而全面地看待西方语言学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与现代人文科学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科学语言学起步比较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曾经非常虔诚地学习西方语言学。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赶上西方语言学时,西方语言学已经开始自我反思了。如果认真理解西方语言学的动态,我们可以看到,功能语法学、认知语义学,对过去的结构语言学、形式句法学都有更新和补充的作用,这是语言学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应该走一条既学习西方又自主创新的路呢,还是亦步亦趋地紧跟在西方语言学后头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到我们的面前。有几个概念,我认为应当进一步明确,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第一,“国际化”不等于西化。国际化是平等交流和互相学习,是所有的语言研究和各国的语言研究互相促进,使世界的语言学研究能够共同前进。国际化不能排除某一种语言的研究,国际化不是西化。应该说,除了美国以外,法国、英国、苏联、东欧、北欧、印度都有非常成熟的语言学。这些语言学,特别是苏联的语言学也曾经影响过我们。这些语言学都是在他们熟悉的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说,在国际的语言研究中,汉语研究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说汉语,汉语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比如形态不是很丰富、有声调、语素单音节等等。我们努力地去追求语言研究的科学化,这是对的;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忘记汉语的事实,那么我们会把用另外一种语言研究出来的东西强加到汉语头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很多解释就会出现一些漏洞。所以,我们应该对国际化这个概念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果把国际化等同于西化,甚至美国化,再把引进当成实现国际化的第一条路,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必然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是永远不会有话语权的。

第二,创造不是时间越接近现代越新。人们常常认为最后出现的东西就是最新的东西,最后被提出的东西就是最新的理论。这个认识很值得重新考虑。实际上,与我们零距离的东西往往受到我们自己认识的限制,未必都是新的,也未必都是创造。有些在时间上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有可能只是在重蹈前人的覆辙,而且可能是一条曾经导致失败的覆辙。而某些我们确实曾经否定了的、以为是应当抛弃的、久远的东西,在我们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当我们的知识掌握得更多,当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深入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东西恰恰是真理。所以,并不是最新提出来的东西就是新东西,而应该是经过人们成熟地验证了的东西,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验证仍然倒不了的东西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有人为了“求新”常常提出一些听起来耸人听闻的东西,甚至有人用“六书”去分析英文单字,肯定外国古代没有字典,批判索绪尔说根本没有“语言”,只有“言语”……新,往往伴随着时髦,时髦的东西不一定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对“现代化”的东西,都应该有比较清醒的头脑。这样,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可能会少走点弯路。

第三,对西方语言学既不应全盘否定,也不要盲目崇拜。盲目排斥西方的倾向是需要防止的,认为西方的东西都不适合汉语也不符合事实。西方语言学或者国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过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所用的结构分析方

法、描写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以及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等等,都是跟西方学习的。西方语言学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也改造了附庸于文献学的“小学”,西方的语言学在数理科学和各种各样的新的人文科学的激励和促进下,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框架,比较严谨,容易操作,这一点也曾给过我们很多启发。苏联的语言学是非常注重哲学方法论的,列宁《哲学笔记》中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虽然带有某些政治色彩,但是诸如关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论断,关于语言发展几个规律的论断,关于语言要素的一些论断,仍然给我们不少的启示。这些年来无论是结构语言学、逻辑语义学,还是形式语法,包括最近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都给过我们不小的帮助和启示,我们是应该继续学习和关注的。

但是,在学习西方语言学的有些理论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不要走向反面。首先,坚持科学性是对的,但不要走到科学主义的地步。语言本身是带有人文性和社会性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数理符号。如果把语言完全数理化,就会把语言里的某些信息丢掉。表面上运算越复杂越细致,事实上就会越不准确,因为语言里很多带有人文性的东西在运算中都失落了,这些东西不是数理的东西所能完全取代的。走向极端的科学性就是科学主义,已经不是科学性了。所以研究语言学完全运用走到极端的数理方法,而把人文的东西忽略,它本身就已经脱离了语言事实。为了找回失去的人文性和社会性,西方语言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学和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结合,越来越注意到语义的重要性。西方人已经在反思了,而我们却还在拼命搞纯形式,片面追求用数理的方法来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理论”包装,这就会走向反面。内容决定形式这个哲学命题不应当推翻。形式由内容决定,如果没有内容,形式不会产生。语言完全抽象为数理性,有时确实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必然要失落一些东西,使我们面对的语言现象是有缺陷的、不完全的,不能反映语言本来面目的。

其次,研究语言采用逻辑推理是对的,但研究方法不能绝对化。西方有一些语言学流派认为,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方法必须走到极端,如果不走到极端就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起作用。有些语言学常常完全或部分脱离事实去创建一个理论框架。语言事实能放进去的就放进去,即使只解决百分之一的语言事实也很满足,放不进去的那些语言事实再去另找别的新框架。这个办法我们觉得也不是科学的。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必须覆盖相当数量的语言事实。如果覆盖不了,甚至还要被某些语言事实所否定和推翻,那么这个框架就有问题,就必须改变这个框架,而不要立了这个框架就死守着让事实来屈从框架。事实上研究一个问题时任何一个方法都不应该完全极端化。绝对排斥内容、意义和绝对排斥形式和语法,绝对轻视书面语和绝对轻视口语,同样是不聪明的。没有一个人人为构建的框架可以把一种语言的全部事实纳入,更没有一种单一的模式能够把一种语言现象解释清楚,还是应该辩证地、联系地看待问题,如果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有时候会把问题简单化。

在现代西方的语言学史中,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对前面的研究成果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用打倒前人来树立自己;而讲继承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否定前人,但我们不是全部打倒前人再来创建另一个学派;因为历史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继承的发展,在继承中发展的学识会逐渐丰富。在打倒中发展,全破了之后再立,它的进展往往是循环的,前

面的弱点会变成现在的优点,但前边的优点也会变成现在的弱点。在语言学研究是保持在继承中发展好呢,还是交替性地完全打倒旧的再成立一个新的流派来发展好呢?我想还是前者比较科学吧!应该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在继承中发展。

西方语言学的优点中就同时蕴藏着他们的弱点,所以,认真学习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全盘肯定甚至把引进西方与实现现代化等同起来奉为圭臬是有害的。

五 正确看待中国的语言学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自己的语言学传统?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曾经走过漫长的路,到了现代,它的弱点逐步暴露。中国传统语言学有一个比较固化的思维模式,那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说有易,说无难”,没看见的无论别人怎么论证都不信。但是数千年的知识和文化以一个人的视野又能见到多少呢?如果没有见过,都不敢说以后会不会有,完全否定推理,你想这还算科学吗?所以完全实证的方法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约束和局限的。绝对的归纳法,仅仅停留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考据上,可以产生文献学,却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科学的语言学。自己的弱点要认账,比如,中国的训诂学,从汉字出发来研究意义,这是适合汉语的好办法,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把字和词混在一起,由于分辨不清字和词,就经常陷入研究困境。汉字这个书写单位跟词关系非常密切,的确不好分辨,但两者本质上确实不是同一个东西,只要一混淆就会出问题。又比如我们在对语音的感受问题上,由于汉语和汉字都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过去的记音不是用音素符号,包括反切,反切上字是一半,反切下字是一半,老有一段冗余在里头。所以,中国古人在思考声音问题时,多存在用音节的近似性来思考语音的问题,而没有声音分析的习惯,常常讲到的“对转”和“旁转”等概念,因为没有细致的音节结构分析理念来支撑,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给人的感觉都比较模糊,即使其中含有很多合理性,现代人接受起来也有困难。这些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我们也要认账。正因为我们认账了,这些年的研究才有所前进。

但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它也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古人不去写专门提升理论的书,但它有潜在的理论。古人的很多关于语言的理念,在西方没有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可惜我们没有很好地把它们发展下去。比如在训诂学里,中国学者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系统性,传统的中国哲学的系统性极大地影响了小学的研究。有了系统性的观念就不会孤立地看待某一个个别事实;所以,中国的语言学家观察语言文字现象信奉联系性,相信这种联系是有序和有层次的。这个认识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从训诂学处理各种语言材料的具体方法看,对这个重要理论,中国传统语言学对它的认识很透彻。

另一方面,中国的语言学很早就非常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而不把它当作从属于语法的東西。为什么中国传统语言学会有这样的观念呢?首先,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西方使用比较普遍的语言里,多数词的意义只有到句子里才能显现,离开了语言环境无法显现。可是在汉语中却不是这样,一部《说文解字》中所包含的每个字,在离开了语言环境以后,几乎都能看见它的本义,也能看到它的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所以中国人一直把意义当作是一个

可以独立研究的东西来看待,而不认为它是从属于语法的。我们的语义观是比较彻底的,在语义上西方语言学达不到我们的研究深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理据性和任意性的认识。现在西方有不少人在批判索绪尔有关语言任意性的理论,特别是现在的认知语言学一直在强调理据性,而否定任意性。其实在中国语言学里,一直认为语言的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不矛盾的,“约定俗成”和“音近义通”可以是共存的。对于后来孳乳出来的词来讲,通过“音近义通”可以在历史中追溯到源头,是可以解释的。事实上理据性和任意性并不是绝对矛盾的,现在的语言学界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不是让任意性去否定理据性,就是让理据性否定任意性,结果都无法确认语言或者词汇发展的本来事实。还有,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设立“义界”的概念,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在音韵学里,从古到今,研究音韵学的人都在同时注意考古和审音,考古是钩稽语音既往的事实,从语言现实中归纳分析出音系——声与声、韵与韵、声与韵之间的各种关系;而审音则是用音理来推断考古的结果是否合理。中国语言学特别看重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符号搬家”那种纯粹形式的运作,他们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所有这些理论我们是不需要学西方的,而我们却常常妄自菲薄。

明明自己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从西方拿回来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从50年代开始,我们的学界就一直在批判,批判“释名”,批判“声训”,批判章太炎的《文始》,批判“音近义通”。中国汉语的词源学有大量的语言事实存留在语料中,本身也有很多理论建树,并且提出了很多相关命题。可从50年代以来这些很好的方法就都被我们否定光了,什么都批判就会给人以中国就没有什么好东西的错觉,使人们误以为是中国的就是不好的。中国语言学人发展自己语言学和继承优良传统的自信心因而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这个恶果长期存留于人们的脑子之中,是在不言之中的。脑子里深层的东西是不自觉的,越不自觉的失误越难改正。在自觉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不好,可以否定它;最可怕的是存留在脑子深处,麻木地接受了。最后结果就是对于中国语言学很多宝贵的“金子”我们都没看到,很多东西都被糟蹋了。

现在很多人已经读不懂文言文了。其实从“五四”开始的反对文言文运动,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文言文中的文化垄断和封建思想。但是最后结果之一就是现在没有多少人能读文言文了。中国的几千年的东西都在文言文的书面语文献里,你没有文言文的语感是掏不出来的,掏不出来东西当然就没有感觉。这样的结果是当时激烈反对文言文的钱玄同和鲁迅等人始料未及的。钱玄同和鲁迅都是非常熟悉文言文的,文言文他们读起来就跟白话文一样。如果他们当时能想到反对文言文的结果是现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无法读懂文言文,连有些学历史的人作研究都需要白话翻译,我想他们当时就不会那么偏激了,多少也会给咱们留一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谈继承是多么的艰难。而中国的语言学理论是潜在的,不是明显的通论,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在大量地失落。所以我们更有责任认真地在继承的过程中,在自己汉语的事实中产生出新的理论,这些理论相当一部分是不会和西方语言学理论背道而驰的。我主张大家都从自己熟悉的切入点出发,用科学的、自己熟悉的材料和方法,去追求科学的真理。最后只要命题本身是科学的,我相信都会殊途同归的。我们不需要互相攻击反对,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熟悉的材料、自己选择的切入点去发掘自己固有的和熟悉的东西,为国际语言学

添砖加瓦,而不要盲目追随别人。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语言学的后面。人家研究了几百年,已经在反思,我们还去重复人家遗弃了的东西;人家刚刚介入,还不成熟,有许多争论,我们就去毫不怀疑地紧跟;我们自己已经说了很多时候的东西,没有人关注,外国人说得还没有我们透彻的,却马上就受到重视——这一切是多么的不明智。

没有了自主创新,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和西方对话。西方语言学也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不加选择地拿来就用,不管用起来顺手不顺手,把那些片面的东西也强行用于汉语,只能帮人家圆谎。唐代的训诂学有一个习惯,叫做“疏不破注”,就是在古代文献中汉朝人对某句话的解释不管对不对,唐朝人也跟着做一样的解释;明知道错了,也不能“破注”。这就是盲目替古人圆谎,是要不得的。现在我们盲目给西方人圆谎,不是同样要不得吗?事实上我们更应该立足于自身的发展,要有明确的判断能力,知道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而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按照自己的路来走走。我觉得如果能用自己的路走的,暂时先不用西方的路走,先用自己的路走走看,最后再看看能不能和西方科学的道路走到一起。

其实,我们批判的习惯仍然没有减少,前面我说盲目为西方圆谎,其实,我们也跟着现在的西方人批过去的西方人,也很盲目。比如现在对索绪尔的批判,就有些过火,事实上他的很多东西也很难批倒,根本不应该用一个否认另一个,应该先看看里面有没有合理因素,合理的我们就要把它留下。粗暴地“破”当然比“立”要容易得多,无非是骂它一通,拿刀子砍掉,以后不用它就完了;但把合理因素丢掉以后,转了一大圈发现找到的东西还是我们以前砍掉的,那就得不偿失了。语言学应该走自主创新的路,从汉语事实出发。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以后再去学习西方,才能尽快地产生自己的语言学,才能和西方语言学平等对话。

语言学的路还是很宽广的,现在队伍越来越充实,队伍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现在研究词汇的学者,如果不懂古汉语是不可能做下去的,因为古今词义的发展都是绝对贯穿的。过去学汉语的人对少数民族语言很少关注,而现在可以看到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全面,它们的深入研究给我们的汉语研究带来了许多启示和补充。以前我们比较关注语法,现在我们把语法和语义结合起来,对于一些语法结构的认识会比过去更深入一些,而不仅仅停留在纯粹形式的表面。涉及到语义和语法的关系,大家疑惑的是到底是语法决定语义,还是语义决定语法。其实,倒不妨一刀切开,大家先彼此在自己的领域和系统中研究透彻,然后再看看谁决定谁。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语法研究语义,然后再把语义拿到语法中去验证,那不是循环论证吗?语义本身离开了语言环境,会有自己的相互依存的系统性。我们要在这种系统性中建立有独立研究价值的语义学,将语义自身的系统研究透彻以后,再把它放到语法里看看,就会知道它和语法应该是统一的。所以我们以往很多的思路和很多以前我们已经成为惯性的东西,在今天是不是都应该重新整理一下?现代社会知识丰富,而且各种知识已经走向社会,深入人心。现在,各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丰富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横向地参考比较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打破过去的陈规,尊重语言的事实,用一种新的思路和正确的继承态度来对待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我相信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明天会更加灿烂辉煌。

(王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